

20 世纪前期中国东南乡村生活图景

林 枫 柯丽玉

内容提要:卜凯(John L. Buke)调查是 20 世纪上半叶最为重要的中国农村调查之一。本文选取卜凯第一次调查 15 个地点中的福建连江,具体分析其调查资料,展示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东南乡村生活的可能情景,试图对 20 世纪前期革命的发生再做思考,并对滨海地域社会生计方式再做探究。

关键词:卜凯调查 乡村生活 中国革命 滨海地域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凋敝。对这一判断,从当时到现在,学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但对于“凋敝”出现的大致时间段,看法并不一致。而这个时间段的确定,对于解读中国革命的发生,具有参考意义。卜凯调查是 20 世纪上半叶最为重要的中国农村调查之一。本文选取卜凯第一次调查 15 个地点中的福建连江,具体分析其调查资料,展示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东南乡村生活的可能情景,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试再做思考。另一方面,卜凯调查地点距离大海近在咫尺,但当地生计方式与“依海为生”却距离甚远,从这点出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滨海地域社会。

一、卜凯调查介绍

20 世纪 10—30 年代,是中国农村调查的一个高峰期,这些调查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珍贵文献,^①卜凯调查即为其中重要一项。卜凯 1914 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第二年就来到安徽宿州,以传教士身份从事农村改良试验与推广,在中国致力农业经济学的教学与调查几 30 年,发表了多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中国农业经济学著作。20 世纪 30、40 年代出版的《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堪称中国近代农业经济调查成果的典范。

20 世纪 20—30 年代,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巨额资助下,时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的卜凯主持了两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第一次调查实施于 1921—1925 年,调查结果《中国农家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1930 年出版英文版,1936 年译成中文。^②调查目的,一则训练学生如何使用调查方法以研究农业经济与农业经营,以期明了农家经济之机构与内容;二则使国际上更深切认识中国农民生活资源与生活状态。^③第二次调查实施于 1929—1934 年,包括除东三省之外的 22 省 168 个地区 16786 个田场 38256 个农户。调查结果《中国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1937 年出版英文版,1941 年译成中文。^④调查目的:“第一,训练学生谙习土地

[作者简介] 林枫,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厦门,361005。柯丽玉,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361005。

① 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0 年第 4 期。

② John Lossing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A Study of 2866 Farms in Seventeen Localities and Seven Provinces in China*,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本文使用版本为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张履鸾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正文中仅注页码处,即引自本书;文中引用数据皆来自本书,因篇幅所限,不一一标注页码。

③ 谢家声、章之汶:《序》,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 1 页。

④ John Lossing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16786 Farms in 168 Localities and 38256 Farm Families in Twenty-two Provinces in China, 1929 - 1933*,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37. 本文使用版本为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乔启明等译,学生书局 1971 年影印版。

利用之调查方法;第二,蒐集中国农业知识,俾为改良农业之借鉴,及决定全国农业政策之根据;第三,俾世界各国关怀中国福利之人士,得知中国土地利用,食粮,及人口之概况。”^①

第二次调查虽涉及区域广大、田场众多,但所作分析、所列图表系就全体情形而言,若就单一地方来说,第一次调查呈现资料无疑更为详尽。为此,本文以第一次调查的单个地点——福建连江试做分析,这样或更能展示20世纪20年代中国东南一隅乡村经济生活的清晰面貌。

第一次调查费时5年,实际发生于1921年4月—1925年9月间,调查地点15个,河北盐山、安徽来安各调查2次,因此调查点为17个。^②调查了7省17个地方的2866个农家,涉及耕地面积约8500公顷(21000英亩),资本约500万元,人口约17000人。采用以村庄为基点的区域性调查方法,尽量动用生于本地、了解本地的调查员,并以此作为调查区域选择的重要标准,卜凯自称,“首要条件,即为找得一个当地土著而且同时系与农民熟习的调查员,因是吾人对于调查地点的选择,遂不得受其限制”(第3—4页)。调查的细致严谨,在民国农村调查中实属仅见。关于其调查方法的优劣,已有精论,^③本文不再赘述。全文12章4附录,最为精彩的即为238表、68图,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分析的基础资料。令人遗憾的是,如果能够获观卜凯调查的第一手未经整理的资料,如果能够补充连江地方文献,本文的分析可能更为翔实生动,这一工作只能留待以后。

二、连江的三个调查点

连江是卜凯第一次调查中福建省内的唯一地方,也是此次调查最南的地方,可能也是最近海的地方。

1922年8月—1923年7月,郑庚负责调查了连江161个田场^④,包括山藏山^⑤23个、东湖96个、山下42个。调查的田场总面积162.54公顷,作物面积162.52公顷,作物公顷面积184.05公顷。^⑥

调查人选、调查地点的选择,比较切合卜凯的设计。郑庚应是东湖人,郑是东湖大姓,因此其在当地有着便利的人际关系网络,方便调查的开展。我们在现存的东湖郑氏谱牒中未见郑庚,家族老辈亦语焉不详。但乡间传说确有其人,据称早年已经外迁。查阅资料,连江郑庚是南京农业大学已故知名教授。^⑦东湖郑氏人多势众,且功名不绝,略举数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举人郑霄;光绪十二年(1886)武举正奏郑仲和;乾隆十六年(1751)岁贡郑耀宗,惠安训导;顺治拔贡郑国履,入国子监。^⑧

连江境内多山,山岭之间,比较成规模的有三个平原:敖江平原、琯头平原、马透平原。敖江北半部是低丘河谷小平原,琯头是冲积海积平原,马透是海积平原。

东湖是县城近郊大村庄,地处敖江平原。县内最大河流敖江发源于鹫峰山东南麓,经现在的小沧、潘渡、敖江、江南诸乡镇,自东南流经县城后,折向东北,经浦口、东岱,从东岱的百胜村注入东海。

① 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序”第1页。

② 具体分为中国北部和中东部。北部9个点,包括安徽怀远、宿县,河北平乡、盐山(1922)、盐山(1923),河南新乡、开封,山西武乡、五台;中东部8个点,包括安徽来安(1921)、来安(1922)、芜湖,浙江镇海,福建连江,江苏江宁(淳化镇)、江宁(太平门)、武进。

③ 李金铮:《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79页。

④ 卜凯调查中,田场、农户两个概念适用范围是一致的,每个农户经营的所有土地作为1个田场单位。

⑤ 山藏山是现在东岱镇山堂村的民间俗称。连江县内有两个方言谐音的 shantang,为示区别,一称鱼池 shantang(即敖江镇杉塘村),一称造瓦 shantang(即东岱镇山堂村)。

⑥ 田场面积:场主耕种或管理的土地之和。作物面积:田场中栽种作物的面积,以及生长草木以供燃料的未垦土地。作物公顷面积:1年中各种作物总共栽培的亩数或公顷数。例如1亩地1年栽种两季作物,就意味着1亩作物面积,2亩作物公顷面积。

⑦ 郑庚(1898—1978),1920年入金陵大学农科,1924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34年获密歇根大学科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广西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南京农学院教授,从事兽医学与病原微生物学的研究。

⑧ 连江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民国《连江县志》卷14《选举》,连江县人民政府1989年印行,第246、254、264、273页。

敖江流域面积 44.5 平方公里,因为与海相接,咸淡水交界面深入河口以上。敖江枯水期,海水可到浦口;敖江丰水期,海水可到浦口镇的柘尾村。东湖有着连江境内最大水利工程“东湖”,据说开挖于隋开皇(581—600)中,周 20 里,上纳九溪,下灌民田 4 万余亩。山下村则有塘名“山下塘”。

山藏山、东湖、山下,三个地点分布在敖江南北两岸,并不完全接壤。东湖所处的是河谷小平原,山藏山、山下所处的是冲积海积平原。清代,连江分五乡,统二十里、四都,凡四十二图。山藏山,治东永贵里;东湖,城西北钦平上里;山下,城东北钦平下里。^①

卜凯原计划将 17 个调查点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因为淮河以南各调查点多数处于长江下游流域,连江虽在地理位置上属中国南部,复因“该地情形与中东部并无多大差异,事实上不致影响到中东部之平均数”,遂以“中东部”概括南部,以与北部相对应。在具体分析时,卜凯有时将北部、中东部按照自然区域再做细分,连江又被列入东南海岸区,以区别于中东部绝大多数调查点所属的长江流域区,“福建连江县的田场,大都在众山的丘壑中,此种冈峦起伏的地形,在该省极为普遍。调查的地区,亦有很少数的梯田。此种丘壑,约高出海面十五公尺。土壤生产力很大。丘壑中主要产稻的地区,为黑色黏质土壤,近河身者为细砂土,山脚为砂质壤土。土壤大都为冲积层,岩石多为花岗石。”(第 8、17 页)

三、连江的土地经营形态

根据卜凯第一次调查资料,我们对当时连江的土地经营形态作出若干释读,包括田场规模、土地投资、租佃关系。

1. 连江田场规模小,单块土地面积小,土地零碎;按照人口计算的耕地面积很小,为了耕作有限的土地,农户要在路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田场小,所以田场上投入的劳动力相对较少,但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和畜力却较高。详见下文具体分析。

全国 17 个调查点,田场面积分成最大组、中大型、中等组、中小组、最小组等 5 组,单个田场面积越大,越需要分成更多的组别,组距也越大。在中东部,连江的组距是最小的,且只分成最大组、中等组、最小组。连江的田场平均面积 1.01 公顷,是全部 17 个调查点中最低的,远低于全国平均数 2.52 公顷,也低于中东部平均数 1.86 公顷。^② 连江的 161 个田场,仅有 2 个面积在 200 亩以上,142 个田场(占比 88.2%) 在 40 亩以下,其中 81 个田场(占比 50%) 不到 15 亩。按照 0—10 亩、11—20 亩、21 亩以上分成三组,对应的田场数分别为 56、55、50,2/3 以上的田场面积不到 20 亩。田场之内,每个田区的平均面积,连江 0.29 公顷,低于中东部的 0.34 公顷。田区与农舍距离,全国平均 0.31 公里,连江 0.58 公里,在中东部是最远的,北方则普遍比较远。

连江农家的人口平均数为 5.02,中数为 5.33,众数为 5.47;全国的对应数据是 5.65、5.67、5.48;中东部的对应数据是 5.53、5.63、5.44。连江 161 户农家,家庭人口数 2—8 口者十分集中,尤其是 3—6 口的农家,占 161 户农家的 77.1%。就人均作物面积而言,全国平均 6.8 亩,中东部平均 5.8 亩,连江平均 3.3 亩,是全国所有调查点中最少的,约当于人均作物面积最多的来安(1921)11.7 亩的 28%。反过来,每平方公里作物面积之人数,全国平均 282 人,中东部平均 324 人,连江 493 人,是全国所有调查点中最高的。每个成年男子单位之作物面积,全国平均 0.55 公顷,中东部平均 0.46 公顷,连江 0.26 公顷;每个成年男子单位之作物公顷面积,全国平均 0.81 公顷,中东部平均 0.68 公顷,连江 0.29 公顷,均为最后一位。

① 连江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民国《连江县志》卷 6《城市》,第 88—90 页。

② 全部调查点(17 处)平均数和中东部调查点(8 处)平均数,均指有统计数据之平均数。

按照工人等数^①计算,仅就简单的算术平均数而言,中东部高于北部,全国平均 2.29,北部平均 2.07,中东部平均 2.55,中东部最低的是武进 1.01 ± 0.02,^②连江仅高于武进,为 1.68 ± 0.06,说明在农业生产上投入的劳动力总量比较少。理论上,田场面积越大,投入的工人等数越多,但各地情形仍有区别。田场面积最小组距对应的工人等数,全国平均 1.42,中东部平均 1.56,连江 1.14,在中东部超过江宁(淳化镇)的 1.12、武进的 0.43,居第 6 位;田场面积最大组距对应的工人等数,全国平均 3.55,中东部平均 3.98,连江 2.61,在中东部超过武进的 2.22,居第 7 位,仍然可以说明连江在农业生产上投入的劳动力不是很高,而且连江的田场面积较小。人工单位^③全国平均 275.3,中东部平均 306.7,连江 231.9 ± 14.87,仅超过武进,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东部投入农业的劳动力较北部为多,而连江在其中相对较少。

田场面积最小组距对应的人工单位,全国平均 111.5,中东部平均 141.8,连江 74.8,在中东部仅超过武进的 56.5,居第 7 位;田场面积最大组距对应的人工单位,全国平均 519.2,中东部平均 548.3,连江 475.0,在中东部超过了江宁、镇海、武进,居第 5 位。虽然仍然可以说明连江在农业生产上投入的劳动力不是很高,但配合其他数据,可以看出连江土地面积大的田场投入劳动力却不少,田场面积与投入劳动力呈明显正相关。详见下文。

各地每作物公顷所需的人工单位,多寡不一。这与耕作方法、土壤、地势、气候,以及畜工的使用(多用畜力则少用人工)均有关系。具体到连江,各类作物情形如下:小麦,全国平均 59.95 人工单位,中东部平均 84.91,连江 140.09,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稻,全国平均 116.67 人工单位,中东部平均 126.09,连江 233.48,远远超过其他地方;高粱,全国平均 72.15 人工单位,中东部仅有连江数据,为 140.09,远远超过北部各地(北部最高宿县仅 83.54);谷子,全国平均 75.54 人工单位,中东部仅有连江数据,为 140.09,远远超过北部各地(北部最高怀远仅 130.20,北部平均 68.37);油菜子,仅中东部有数据,平均 114.95 人工单位,连江 163.44,属最高水平,最低的来安(1922)65.24;山薯,全国平均 118.39 人工单位,中东部平均 130.33,连江 163.44,居第 3 位;^④大麻,全国平均 137.60 人工单位,中东部仅有 2 处数据,连江 186.78,来安(1922)65.24。另外,蔬菜数据悬殊,除了若干地方没有数据或者细化成各种蔬菜品种外,可见的 10 个数据中,连江 233.49,排在全国第 6 位;芋头有 4 个数据,连江 186.78,居全国第 3 位。

至于役畜,按照各组田场有役畜者所占之百分率,连江的数据出现在三个组:最小组、中等组、最大组。田场面积最小组对应的有役畜者所占之百分率,全国平均 34.3%,中东部平均 20.2%,连江 33.9%(相当于每 3 个田场就有 1 头役畜),居第 3 位;田场面积中等组对应的有役畜者所占之百分率,全国平均 84.8%,中东部平均 81.6%,连江 74.5%,居第 3 位;田场面积最大组对应的有役畜者所占之百分率,全国平均 95.2%,中东部平均 97.6%,连江 88.0%,低于江宁(太平门)的 92.9%,中东部其余 6 处则均为 100%,虽然连江位居第 8 位,仍说明大土地面积的田场役畜覆盖面广。

按照畜工单位^⑤,连江的数据依旧出现在三个组:最小组、中等组、最大组。田场面积最小组对应的畜工单位,全国平均 29.5,中东部平均 23.0,连江 17.3,居第 3 位;田场面积中等组对应的畜工单位,全国平均 70.4,中东部平均 50.0,连江 33.9,居第 3 位;田场面积最大组对应的畜工单位,全国平均 156.0,中东部平均 99.1,连江 91.9,居第 4 位。全部田场综合计算,全国平均 90.1,中东部平均

① 工人等数是用来计算田场内工人数量的标准单位,1 个工人等数,等于 1 个工人在田场上工作 12 个月。

② 此处数据引自原文,表示数据在 0.99—1.03 之间。以下用法相同。

③ 人工单位指 1 个普通工人在每天 10 小时内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用以计算工人在田场内工作效率的高低。

④ 若无特指,连江各数据的排序,均指在中东部的排序,下文不再一一说明。

⑤ 指每一役畜于每天 10 小时中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用以计算每一役畜工作效率之高低,由此可以观察田场对役畜的实际使用情况。

67.7,连江 55.4,居第 4 位。北部的役畜使用,明显多于中东部,在中东部,连江对于役畜的使用,属于中等水平。

具体到各类作物所用畜工,可作如下分析:小麦,全国平均 20.08 畜工单位,中东部平均 16.72,连江 28.02,居第 2 位;稻,全国平均 30.63 畜工单位,中东部平均 32.68,连江 49.03,居第 2 位;高粱,全国平均 23.74 畜工单位,中东部仅有连江数据 18.68,低于北部平均数 24.37;谷子,全国平均 24.75 畜工单位,中东部仅有连江数据 18.68,低于北部平均数 25.42;山薯,全国平均 19.83 畜工单位,中东部平均 20.73,连江 28.02,居第 2 位;大麻,全国平均 33.00 畜工单位,中东部仅有 2 处数据,连江 28.02,来安(1922)21.75。

2. 连江田场资本投入不低,相对于劳动力投入,位次高了不少,土地购买费用对于提高资本投入位次,居功至伟。地主出租的土地,相对于自耕农土地质量更好,租佃条件也比较苛刻。详见下文具体分析。

农业资本的投入,全国平均 1769.29 元,中东部平均 2029.86 元,连江 2295.67 元,仅次于芜湖的 3114.94 元,与第 3 位来安(1921)的 2226.26 元、第 4 位江宁(淳化镇)的 2211.10 元颇为接近。连江农业资本的投入可以分成:购进土地 1742.35 元,房屋 351.32 元,牲畜 72.44 元,树木 55.69 元,杂项(或者包括未出售柴火)11.84 元,农具 62.03 元;其中 75.9% 是购买土地的投入,从一个侧面可见当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以及土地价格的高昂。再就具体分项分析,购进土地,全国平均投入资本 1315.24 元,中东部平均 1472.04 元,连江 1742.35 元,排第 2 位;当进土地一项,连江没有数据,中东部地区或者没有数据,或者数据较低;房屋,全国平均投入资本 249.97 元,中东部平均 330.01 元,连江 351.32 元,排第 5 位;牲畜,全国平均投入资本 65.76 元,中东部平均 68.14 元,^①连江 72.44 元,排第 3 位;树木,全国平均投入资本 38.41 元,中东部平均 35.71 元,连江 55.69 元,排第 3 位;杂项,全国平均投入资本 33.49 元,中东部平均 42.43 元,连江 11.84 元,排第 7 位;农具,全国平均投入资本 45.88 元,中东部平均 65.60 元,连江 62.03 元,接近于中东部的平均数,排在第 4 位。

就单个调查点内部而言,田场面积大小,与地价之间不构成明显关系;就全国各调查点来看,无论是算术平均数、中数还是标准差,连江地价都是最高的。每公顷地价算术平均数,全国平均 620.14 元,中东部平均 880.86 元,连江 1701.38 ± 20.97 元,遥遥领先于第 2 位芜湖的 1655.89 ± 17.83 元,中东部其他 6 处均在 1000 元以内。地价多寡,视生产力高低而定,连江地价之所以高,因其作物产量高,而产量是影响利润高低的重要因素。

每公顷田场上所投资本,全国平均 819.56 元,中东部平均 1183.88 元,连江 2273.87 元,居全国第 1 位,不但远高于北部,也高过全国第 2 位芜湖的 1852.04 元不少。连江每公顷田场上的资本投入构成,除了当进土地一项无数据外,依次是购进土地 1725.89 元(占资本总额的 75.9%),房屋 348.12 元(15.3%),牲畜 71.68 元(3.2%),农具 61.41 元(2.7%),树木 55.10 元(2.4%),杂项 11.67 元(0.5%)。土地是中国农业投入中最大的一项,连江亦不例外。卜凯认为,连江每公顷投资额最高,是因为该处的土地异常肥美,地价很高;就全国的情形而言,土地、房屋占用资金较之牲畜、农具、杂项多出许多,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过密、地价甚高,同时缺乏畜牧事业和新式农具;而中东部的农具投入高于北部,是因为中东部的农业利润较大。

卜凯所调查的全部 2866 个田场,排除非场主(即地主)^②的因素,全国平均投入资本 1284.70 元,

① 中东部平均数高于北方,但役畜投入比北方少,也许因为中东部牲畜购置费用比北方高。

② 卜凯调查对场主与地主进行了区分。场主是田场的经营者,可以是自耕农,也可以是半自耕农、佃户。地主纯粹指土地的主人,是土地的占有者,半自耕农、佃农的土地部分或全部来自地主,半自耕农、佃农的田场意味着地主与他们共同投入资本。自耕农的田场则意味着完全没有地主投入资本,场主是唯一投资者。

中东部平均 1397.83 元,连江 1606.38 元,居第 3 位。连江的投入包括购进土地 1053.06 元,意味着除了 689.29 元的土地由地主提供外,而 60.4% 的土地,以及全部的房屋、牲畜、树木、杂项、农具,都由场主负责。这种构成与许多地方不一样,连江非地主身份的土地经营者承担着更大的财务责任,更加凸显土地的重要性。

按照经营状态,我们将田场分成三类,分别观察其资本投入情况:

第一类,全部调查中,自耕农作为场主的共计 1841 个田场,全国平均投入资本 1695.19 元,中东部平均 2099.97 元,连江平均 2424.37 元,仅次于芜湖的 2739.22 元,居第 2 位。最重要的投入仍是土地,购进土地投入 1945.47 元,占资本额的 80.2%;其次是房屋 290.86 元,占 12.0%;树木 69.32 元,占 2.9%;牲畜 60.79 元,占 2.5%;农具 46.72 元,占 1.9%;杂项 11.21 元,占 0.5%。就购进土地所占投入比重而言,连江在全国居第 4 位。

第二类,半自耕农作为场主的共计 446 个田场,全国平均投入资本 1237.22 元,中东部平均 1397.72 元,连江平均 1090.28 元,居第 4 位。最重要的投入仍是土地,购进土地投入 439.84 元,占资本额的 40.3%;其次是房屋 428.30 元,占 39.3%;牲畜 88.19 元,占 8.1%;农具 81.01 元,占 7.4%;树木 39.07 元,占 3.6%;杂项 13.87 元,占 1.3%。就购进土地所占投入比重,在全国各调查点中,连江基本垫底。在这些田场中,地主也有投入,全国平均 766.38 元,最主要表现为土地,以及 30% 房屋、10% 树木;地主购地投资,全国平均 762.87 元,占资本投入的 99.5%,连江平均 1157.78 元,居全国第 2 位。

第三类,佃农作为场主的共计 486 个田场,^①全国平均投入资本 267.99 元,连江平均 501.09 元,居全国第 1 位,高于第 2 名镇海的 449.94 元。佃农没有自己的土地,房屋投入 314.77 元,占资本额的 62.8%;其次是牲畜 62.56 元,占 12.5%;树木 61.71 元,占 12.3%;农具 54.34 元,占 10.8%;杂项 7.71 元,占 1.5%。在全国有房屋投入占资本额数据的 5 个调查点中,连江排第 2 位,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把第 3 位远远甩在后面。地主投入资本平均 1634.10 元,投资内容除土地之外,尚有房屋、牲畜、树木、农具;连江 1518.36 元,居全国第 4 位,仅用于购进土地。

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作为场主的田场,投入是渐次上升的,地主的投入增加了佃农田场、半自耕农田场的资本投入。地主对佃户提供的主要是土地和房屋,也有同时供给牲畜和树木的。

3. 连江的土地租佃十分零碎,租佃条件苛刻,佃农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但佃农也在有限范围内表现出“抗争”;自耕农收益主要来自祖先遗下的财产(土地);地主投资回报率不高,但回报率不是投资土地的主要考虑。详见下文具体分析。

连江的 161 个场主中,自耕农 72 个,占 44.7%;半自耕农 67 个,占 41.6%;佃农 22 个,占 13.7%。卜凯调查全国 17 处 2866 个田场中,有 11 处 641 个田场存在租佃关系,地租类别有分租制、租谷制、分租或租谷制、租金制、租金或租谷制;收租方法有佃农送租、地主自行收租。连江的佃农采取租谷制,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租谷,或折成现金,地主所得占收入总额的 40.2%;佃农送租上门,当然主佃双方在这个过程中各做手脚是在所难免的。

连江地主的利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中东部也是比较高的。地主利润率等于收入减去费用(赋税、种子肥料等田场日常维持费),再除以资本总数。在全国,将土地租给半自耕农的田场,地主得到年利 8.5% 的利润;将土地租给佃农的田场,地主得到年利 8.4% 的利润;将土地租给半自耕农和佃农的田场,地主得到年利 8.5% 的利润。在连江,相对应的数值分别是:租给半自耕农,11.8%,为中东部最高;租给佃农,10.8%,居中东部第 3 位;租给半自耕农和佃农,11.3%,居中东部第 2 位。将连江各种土地耕作形态下的经济要素抽取出来,制成表 1。

^① 卜凯调查将佃农不到 20 家的调查点排除在统计之外,因此三类田场合计数为 2773 个,少于调查总数,而且只有北部 2 个调查点、中东部 6 个调查点有佃农作为场主的田场数据。

表 1

各种土地耕作形态下的经济要素

耕作形态		自耕农	半自耕农	佃农
田场企业之大小	田场面积(本地亩)	27.60	20.10	21.00
	家庭大小(成年男子单位)	3.90	4.09	3.69
利润	场主工价(元)	281.85	250.87	200.22
	田场工作赚款(元)	281.85	300.23	256.10
	每一成年男子单位之家庭赚款(元)	112.57	104.52	97.91
	每个工人等数的工作报酬(元)	201.36	207.92	202.03
	每一作物(本地)亩的纯利(元)	5.96	5.61	7.92
企业之性质	地价(本地亩)	70.20	75.89	72.43
	作物指数	95.80	99.40	102.90
工作效率	每家对于房屋上的投资数(元)	290.86	428.30	314.77
	每人平均之作物(本地亩)	12.90	14.50	13.10

资料来源: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5章第3表“各种土地耕种权的田场经济要素之比较”,参见第201—204页。

具体到地主和佃农对于同一土地的投资与收入,可分为现金、非现金。投资即田场费用,地主的非现金费用包括资本减少、资本5厘利息,现金0.36元+非现金5.20元=5.56元;佃农的非现金费用包括家工、资本减少、资本1分利息、佃农自己劳力的工资,现金2.58元+非现金14.18元=16.76元。收入即田场收入,地主的现金收入包括作物及牲畜8.40元,非现金收入包括家用产品4.10元,总收入12.50元;佃农的现金收入包括作物及牲畜16.27元,非现金收入包括家用产品7.99元、资本增加1.13元,总收入25.39元。每亩总收入37.89元,净收入20.77元,每亩地价103.93元,净收入占地价的20.00%。^① 合计现金与非现金,地主费用占田场费用的24.9%,佃农费用占田场费用的75.1%;地主收入占田场收入的33.0%,佃农收入占田场收入的67.0%(第212—218页)。在计算地主费用的时候,低估了资本利息,如果按照当时农村常见的3分利计算,地主的投入产出比显然要大打折扣,投资土地的回报率低于工商业。乡间工资太低,耕种利润微薄,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甚至地主,都徘徊在低水平的经济循环内。

四、连江的田场收支状况

根据卜凯第一次调查资料,我们对当时连江的田场收支状况作出若干释读,包括田场收入、支出以及利润水平。

1. 连江农户收入比较高,因谷物与蔬菜获得主要现金收入,畜产也是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农户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生产;家庭自我消费的农产品不少,但质量比较低劣。详见下文具体分析。

全国田场平均收入376.24元,中东部平均486.45元,连江615.90元,列第2位。收入分为现金收入、非现金收入两大类。连江田场的现金收入没有果树、蚕桑,包括谷类253.96元、纤维作物3.52元、蔬菜根茎作物及其他作物69.60元、畜产34.62元、杂项53.29元;非现金类包括家用的农产物183.03元、资本之增多17.88元。与中东部其他地区相比,除了江宁(太平门)41.95元、武进53.14元的蚕桑收入,镇海50.38元的纤维作物收入之外,似乎无大差别。具体来说,谷物收入绝对值列第3位;蔬菜列第1位,可能因为连江的调查点地近城郊,所以蔬菜成为谷物之外的重要现金收入来源。谷类占农户现金收入的61.2%,其比例在中东部居第5位;蔬菜占16.8%,居第1位;杂项占12.8%,列第3位;畜产占8.3%,并列第4位;纤维作物占0.9%,居第3位。

按照经营状态,我们将田场分成三类,分别观察农户收入情况:

^① 卜凯认为全国土地价格普遍虚高,纯收入不能超过地价的10%。参见第217页。

第一类,作为场主的自耕农,全国平均收入 334.21 元,中东部平均 461.81 元,连江 606.26 元,列第 1 位。连江自耕农场主的现金收入包括谷类 231.15 元、纤维作物 0.47 元、蔬菜根茎作物及其他作物 112.26 元、畜产 22.33 元、杂项 51.36 元;非现金类收入包括家用的农产物 176.06 元、资本之增多 12.63 元。与中东部其他地区相比,连江的谷物收入列第 3 位,蔬菜遥遥领先。

第二类,作为场主的半自耕农,全国平均收入 357.02 元,中东部平均 445.66 元,连江 501.89 元,在中东部次于芜湖的 656.18 元,列第 2 位。连江半自耕农场主的现金收入包括谷类 202.47 元、纤维作物 6.76 元、蔬菜根茎作物及其他作物 27.31 元、畜产 49.15 元、杂项 56.02 元;非现金类收入包括家用的农产物 136.20 元、资本之增多 23.98 元。蔬菜不再是收入的主要构成,低于杂项与畜产,可能是因为对于半自耕农来说,谷物生产填饱肚子是生产的最重要目标,蔬菜生产虽然可以获得更多收入,但也存在更多的风险,因而使其更多地注重谷物及与谷物相联系的畜产。相比中东部其他地区,连江的谷物收入列第 3 位;纤维作物、蔬菜、畜产,虽不突出,均居第 1 位;杂项、家用农产物,则居第 2 位。

第三类,作为场主的佃农,全国平均收入 312.27 元,连江 370.98 元,位列全国第 2 位。连江佃农场主的现金收入包括谷类 109.51 元、纤维作物 3.68 元、蔬菜根茎作物及其他作物 42.65 元、畜产 30.61 元、杂项 51.30 元;非现金类收入包括家用的农产物 116.75 元、资本之增多 16.48 元。谷物收入排在全国第 3 位,杂项居第 2 位,蔬菜居第 1 位,畜产居第 3 位。虽则作为场主的佃农收入居全国第 2 位,但家用农产物收入 116.75 元,居全国第 5 位,或是因为连江佃农生活比较节约?

2. 连江田场总体支出水平不高,但单位面积支出水平较高;家庭成员提供的、不计入现金开支的劳动力,是田场支出的最大项,雇工费用或许因此降低,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均如此,但各具特点;作物种类是影响劳动力投入的重要因素,而劳动效率偏低也影响了劳动力的总投入。详见下文具体分析。

单个田场生产支出,全国平均 136.64 元,中东部平均 198.23 元,连江 145.57 元,列第 6 位。支出也分为现金支出、非现金支出两大类。连江田场的非现金类支出包括家工^① 94.19 元,资本之减少 6.67 元。在现金类支出上,租金一项不计,连江各田场平均 44.71 元,包括雇工 9.19 元(占 20.6%),房屋及其修理费 6.38 元(占 14.3%),农具及其修理费 5.66 元(占 12.7%),肥料 4.44 元(占 9.9%),饲料 2.33 元(占 5.2%),种子 2.55 元(占 5.7%),地税 5.89 元(占 13.2%),购买牲畜 3.17 元(占 7.1%),杂项 5.10 元(占 11.4%)。分项费用中,连江田场的雇工支出在中东部最低,较倒数第 2 江宁(太平门)的 21.24 元还低了不少;连江购买牲畜的支出,也是中东部最低。中东部来看,肥料、饲料、种子、地税的支出,各地悬殊甚巨,连江相对均较低,如肥料,中东部最高的是武进 16.77 元,最低的是芜湖 0.66 元;饲料,超过 20 元的有来安(1921)、武进、来安(1922);种子,最高的来安(1921)16.15 元,最低的武进 0.13 元。房屋及其修理费、农具及其修理费、杂项,差别不是很大。

最大项的支出实际上是家庭成员提供的劳动力,占支出总额的 64.7%。这一比重,就全国来看,连江仅次于新郑,列第 2 位,可见当地农事之“内卷”,家庭成员不计成本地在单位面积上投入劳动。

作物种类是影响劳动力投入的重要因素,连江全年在各种作物上投入人力钟点 372764 小时,其中早稻和晚稻 231680 小时,山薯 103945 小时,其他作物 37139 小时;投入畜工钟点 72618 小时,其中早稻和晚稻 47928 小时,山薯 17227 小时,其他作物 7463 小时。早晚稻不但单位面积投入劳动多,而且由于种植面积大,直接影响了投入的钟点数:每公顷投入的人工钟点数,早稻和晚稻 2338.5 小时,

^① 卜凯调查将劳动力分为三类:家工、雇工、场主。家工指的是场主本人之外的家庭成员劳动力。

山薯 1667.9 小时,其他作物 1639.7 小时;每公顷投入的畜工钟点数,早稻和晚稻 483.8 小时,山薯 276.4 小时,其他作物 329.5 小时。总体而言,中东部劳动力投入较北部大,主要由于中东部作物的生长期更长,水稻种植也比别的作物更为集约化。卜凯认为劳动工具也是影响劳动力投入的重要因素,采用较为省工的农具,人工费即可望降低。

按照经营状态,我们将田场分成三类,分别观察农户支出情况:

第一类,自耕农作为场主,全国平均支出 131.37 元,中东部平均 204.16 元,连江 128.90 元,居中东部最后一位,最高的是来安(1921)368.38 元。连江自耕农场主的现金支出包括雇工 4.45 元,房屋及其修理费 3.26 元,农具及其修理费 2.68 元,肥料 2.98 元,饲料 2.11 元,种子 0.88 元,地税 6.89 元,购买牲畜 2.44 元,杂项 3.18 元;非现金类支出包括家工 93.88 元,资本之减少 6.15 元。最大项的支出仍是家庭成员提供的劳动力支出,占支出总额的 72.8%,自耕农尽可能在劳力上投入,以节省其他方面的现金开支。种子开支非常低,但在中东部已经是最高了,来安(1921)仅有 0.02 元。

第二类,半自耕农作为场主,全国平均支出 125.77 元,中东部平均 175.04 元,连江 163.20 元,居中东部第 3 位。连江半自耕农场主的现金支出包括雇工 14.25 元,房屋及其修理费 11.04 元,农具及其修理费 8.99 元,肥料 5.05 元,饲料 2.86 元,种子 4.44 元,地税 1.58 元,购买牲畜 4.06 元,杂项 6.59 元;非现金类支出包括家工 95.80 元,资本之减少 8.54 元。半自耕农场主的支出状况出现了明显变化,支出总额较自耕农增加不少。最大项的支出仍是家庭成员提供的劳动力支出,占支出总额的 58.7%,但这个比例低于自耕农。劳动力投入之外其他方面的开支均高于自耕农。杂项各地差异不大;之外,种子、房屋及其修理费、农具及其修理费、肥料等项,连江半自耕农场主在中东部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雇工、地税、购买牲畜、饲料,则均居中东部末位或最后一档。

第三类,佃农作为场主,支出介于半自耕农、自耕农之间,但支出结构也有自己的特点。全国平均支出 163.40 元,连江 130.69 元,北部 2 个调查点以外,连江在中东部仅高于镇海的 97.85 元。连江佃农场主的现金支出包括雇工 9.27 元(原书第 102 页误作 92.7 元),房屋及其修理费 2.36 元,农具及其修理费 5.27 元,肥料 7.36 元,饲料 1.46 元,种子 2.27 元,购买牲畜 2.86 元,杂项 6.80 元;非现金类支出包括家工 90.32 元,资本之减少 2.72 元。最大项的支出仍是家庭成员提供的劳动力支出,占支出总额的 69.1%,介于半自耕农、自耕农之间。种子、农具及其修理费的支出,居中东部第 2 位;房屋及其修理费、肥料、杂项等支出的排序,在中东部相对居中;雇工、饲料、购买牲畜的支出,居中东部最低档。

按照公顷计算的生产支出,全国每作物公顷支出平均 46.37 元,中东部平均 76.65 元,连江 127.35 元,在中东部是最高的,较第 2 位镇海的 93.35 元高出 36.4%。在现金支出上,租金一项不计,连江各田场平均 39.11 元,包括雇工 8.03 元,房屋及其修理费 5.58 元,农具及其修理费 4.95 元,肥料 3.89 元,饲料 2.04 元,种子 2.23 元,地税 5.16 元,购买牲畜 2.77 元,杂项 4.46 元。非现金类支出包括家工 82.40 元,资本之减少 5.84 元。

连江田场的支出,除了雇工、饲料、肥料比较低之外,其余都较高或至少在中东部的中位。农具及其修理费支出,在中东部是最高的,来安(1922)最低,0.60 元;种子支出,最高的镇海 3.80 元,最低的武进、江宁(太平门)0.06 元;地税支出,为中东部第 2 位,最低的来安(1922)1.07 元;购买牲畜的支出,为中东部第 3 位,江宁(太平门)最低,1.37 元;杂项支出,为中东部第 2 位,江宁(淳化镇)最低,0.92 元。

工作效率或者劳力效能,可以用多种方法进行测算:

第一种方法,用每个工人等数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来计算。每个工人等数所种的作物公顷数,全国算术平均数为 1.71 公顷,中东部算术平均数为 1.21 公顷,连江最低,0.58 ± 0.02 公顷,江宁(淳

化镇)最高, 2.25 ± 0.03 公顷。全国平均中数 1.43 公顷, 中东部平均中数 0.97 公顷, 连江最低, 中数为 0.50 ± 0.03 公顷, 江宁(淳化镇)最高, 中数为 2.24 ± 0.04 公顷。

按照田场大小和每个工人等数所种的作物公顷数之关系, 分成三组, 相对应的每个工人等数所种的作物公顷数为: 最小组 0.30 公顷, 中等组 0.57 公顷, 最大组 0.91 公顷, 全部平均 0.58 公顷。可见, 连江的工人效率是比较低的。

第二种方法, 用每个工人等数所工作的人工单位来计算。每个工人等数的人工单位, 全国算术平均数 119.4, 中东部算术平均数 124.2, 连江居第 5 位, 为 119.4 ± 3.43 ; 全国平均中数 108.5, 中东部平均中数 114.6, 连江中数居第 6 位, 为 103.1 ± 4.30 。

第三种方法, 用役畜单位所种作物公顷数、所工作的畜工单位数来计算。全国平均每个役畜单位^①所种作物公顷为 3.29 公顷, 中东部平均 2.47 公顷, 连江平均 1.20 公顷, 在中东部仍是最低的。每个役畜单位所种的作物公顷数, 连江分为三组: 最小组 0.32 公顷, 中等组 0.75 公顷, 最大组 1.98 公顷。

具体来看, 连江有 1 头黄牛的田场有 79 个, 1 头黄牛耕种作物公顷中数为 0.86 公顷, 全国平均中数 1.62 公顷, 中东部平均中数 1.20 公顷, 连江仅高于武进的 0.65 公顷, 排名倒数第二; 有 2 头黄牛的田场 12 个; 有黄牛水牛各 1 头的田场 5 个。

再按田场大小与有役畜的农家其每个役畜单位所工作的畜工单位多寡, 全国平均每个役畜单位所做之畜工单位为 62.8, 中东部平均 41.8, 连江平均 45.0, 为中东部第 4 位。每个役畜单位所做之畜工单位, 连江分为三组: 最小组 12.6, 中等组 29.9, 最大组 72.9。连江役畜的工作效率比较低。

农工种类分为家工、雇工、场主, 他们的工作费用各自占工作费用总额中的百分率, 可用于观察家内劳动、雇工在生产支出中的比重。家工, 全国平均 42.4%, 中东部平均 44.7%, 连江 47.9%, 居第 5 位; 雇工(长短工合计), 全国平均 19.5%, 中东部平均 20.1%, 连江 4.7%, 为中东部最低; 场主, 全国平均 38.0%, 中东部平均 35.2%, 连江 47.4%, 居第 2 位。

场主不计, 再按照支付费用来计算家工和雇工在田场工作中的比重。家工, 全国平均 65.5%, 中东部平均 66.1%, 连江 91.2%, 为中东部最高; 雇工(长短工合计), 全国平均 34.5%, 中东部平均 33.9%, 连江 8.8%, 为中东部最低。连江家工比重之所以高, 可能是因为女工的使用, 女工, 全国平均 21.1%, 中东部平均 31.6%, 连江 52.7%, 为中东部最高; 童工在田场工作中的比重也不低, 全国平均 5.7%, 中东部平均 3.4%, 连江 3.6%, 居第 3 位。雇工中, 连江的短工要多于长工, 长工, 全国平均 24.1%, 中东部平均 21.7%, 连江 2.3%, 为中东部最低; 短工, 全国平均 10.0%, 中东部平均 11.9%, 连江 6.5%, 居第 6 位。

长工薪资全国总体较低。北部平均 41 元, 中东部平均 79 元, 最低的河北盐山(1922)26 元, 连江全国最高, 96 元; 就全国而言, 各地伙食与薪资相差无几。每公顷的人工费用(包括场主), 全国平均 50.93 元, 中东部平均 82.80 元, 连江 173.94 元, 在中东部最高, 高出第 2 名镇海的 110.44 元不少, 最低的江宁(淳化镇)31.54 元; 人工费用(不包括场主)占各种田场费用总额之百分比, 全国平均 63.5%, 中东部平均 63.2%, 连江 71.0%, 居第 4 位, 最高的芜湖 74.6%, 最低的武进 28.5%。连江的单位面积人工费用之所以较高, 一则因为工价高, 二则因为投入人工多。

3. 卜凯用两组 12 种标准计算田场利润, 连江田场利润均处于中东部乃至全国的较高水平。田场规模直接决定田场收益, 即规模越大的田场收入越高, 规模效益明显, 资本投入与收益构成的投入

^① 卜凯调查, 将家畜按照饲养用途分为肉用、卵用、役用, 家畜单位也相应分为生产畜单位、役畜单位。将 1 头黄牛作为 1 个标准单位, 其他各种牲畜按照食量、产粪量, 折算为倍数或分数, 2/3 头水牛、马 1 匹、驴 2 头, 都是 1 个标准单位。

产出比较高。由于土地相对于人口的稀缺,致使每户农家经营田场面积小型化,而田场面积过小,又不够经济,利润会降低。个体家庭从农业中获取的收益也较高,但农业以外的收益不明显。详见下文具体分析。

目的不同,田场利润计算标准不同,得出的利润数据也不相同。卜凯用 8 种不同标准分别计算,全国平均田场利润从 -52 元到 291 元,差别很大。从田场收益、场主家庭收益、家庭进款、场主工价、田场工作收益(与场主工价类似,不过以田场为单位)、田场投资利率、工作报酬、每个工人等数的工作报酬、每一作物公顷的纯利等不同指标细致探究连江的田场利润水平,虽则最后得出的利润数据不同,但在全国或中东部地区的排序基本不变。

如田场收益。由单个田场收入、单个田场支出归并得出单个田场经营周年丰歉,全国田场平均收益 239.60 元,中东部平均 288.19 元,连江全国最高,470.33 元。连江的田场收入不是最高,但其支出相对较低,对抵之后,收益最高。

再如场主工价。卜凯认为这是计算利润的最佳标准,场主收入减去支出,余数再减去 8% 的投资年利,但受到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等物投入资本的影响,如果土地等来自购买,就要计算投资年利,如果来自继承,就不用计算投资年利,而投资年利的扣除与否,直接影响最终利润数值。全国平均场主工价 87.42 元,中东部平均 123.34 元,连江全国最高,258.75 元,稍高于第 2 位江宁(淳化镇)的 255.75 元。全国平均中数 51.28 元,中东部平均 91.95 元,连江 176.47 ± 22.13 元,在全国仅次于江宁(淳化镇)的 216.87 ± 8.30 元。

复如每一作物公顷的纯利。因为土地相对于人的稀缺,每一作物公顷的纯利要比工人等数工作报酬更为合理。每一作物公顷纯利算术平均数,全国平均 11.86 元,中东部平均 25.36 元,连江 141.96 ± 9.60 元,全国最高,较之第 2 位江宁(淳化镇)的 54.21 ± 1.64 元高出许多,中东部还有江宁(太平门)、来安(1922)、芜湖等三处出现负数。全国平均中数 7.09 元,中东部平均中数 21.19 元,连江 129.12 ± 12.03 元,也是全国最高。纯利出现负数,是因为收成不好,连工资都不够应付。

将连江田场按规模分为最小组、中等组、最大组三组,分别考察各组田场对应的田场平均收益、家庭平均收益、每个成年男子单位平均家庭收益、场主工价、每个工人等数的工作报酬、每一作物公顷纯利。连江各田场平均收益 470.33 元,最小组平均收益 181.91 元,中等组平均收益 376.72 元,最大组平均收益 896.33 元。连江平均家庭收益 481.45 元,在中东部仅次于江宁(淳化镇)的 493.17 元;连江最小组田场对应的家庭平均收益为 198.09 元,中等组田场对应的家庭平均收益为 368.85 元,最大组田场对应的家庭平均收益为 922.67 元。另外,按照每个成年男子单位平均家庭收益计算,连江 121.95 元,高于江宁(淳化镇)的 115.51 元;连江最小组田场对应的每个成年男子单位平均家庭收益为 66.50 元,中等组田场对应的每个成年男子单位平均家庭收益为 92.80 元,最大组田场对应的每个成年男子单位平均家庭收益为 184.31 元,不但规模经营效果显著,而且个人产生的利润处于较高水平。场主工价亦与田场大小相关,连江平均每场场主工价 258.75 元,其中最小组田场对应的场主平均工价为 116.21 元,中等组田场对应的场主平均工价为 204.44 元,最大组田场对应的场主平均工价为 478.15 元。田场越大,场主工价(包括从管理中得到的收益)越高。每个工人等数的工作报酬与田场规模直接相关,连江各田场每个工人等数平均工作报酬为 204.23 元,居中东部第 1 位;其中最小组田场对应的每个工人等数平均工作报酬为 133.68 元,中等组田场对应的每个工人等数平均工作报酬为 205.16 元,最大组田场对应的每个工人等数平均工作报酬为 282.01 元。每一作物公顷纯利亦与田场规模相关,连江各田场平均每一作物公顷纯利,最小组田场对应的为 89.89 元,中等组田场对应的为 155.97 元,最大组田场对应的为 184.91 元。

五、连江的农产物与农家生活

根据卜凯第一次调查资料,我们对当时连江的农产物与农家生活作出若干释读,其既有中国东南地区的一般特征,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1. 连江作物品种比较单调,全部田场均有栽培稻的记录,而山薯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复种指数与冬季作物的种植情况距离可以达成的理想状态较远;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连江的作物单位面积产量颇高;农产物的商品化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与此相联系的是手工业的精细化分工。详见下文具体分析。

卜凯将超过总栽培面积5%的作物归纳为17种,连江仅有3种,面积最大是稻,第二是山薯,第三是小麦(也与其他多种作物合种),3种合计达栽培面积的95%;芋头某种程度上也是作为粮食,而不是辅食蔬菜,芋头与山薯同归入块根茎类,合计为34.3%。有100%的田场种植水稻,70.8%的田场种植山薯,37.3%的田场种植蔬菜,35.4%的田场种植小麦,22.4%的田场种植油菜子,5.0%的田场种植大麻,4.3%的田场种植芋头,各种作物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就全国来说,谷类与种子作物占到作物公顷面积的92.1%,块根类占3.8%,二者合计占95.9%;纤维作物占1.9%,蔬菜占0.9%,杂项占0.9%,果树占0.4%。连江与全国情形相比,粮食类同样重要,但块根类的比例因为山薯而陡升,中东部第2位的镇海仅3.9%;也许因为地处城郊,蔬菜类比例稍高,在中东部居第2位;油菜子因为榨油的需要而有一定比例的种植,在中东部仅次于芜湖;纤维类主要是大麻,在农作中满足了部分需要,还有一定数量的棉花输入;连江没有果树、大豆的数据。

在连江,同一地块一年可能收获两次甚至更多,将全年收获按100%计算,一般的情况是:第一次收获为小麦(谷类)的有7.3%,稻(谷类)44.8%,油菜子(油类)1.7%,山薯(块根类)33.5%,大麻(纤维类)0.5%,蔬菜0.1%,其他0.4%(芋头0.3%,杂项0.1%);第二次收获为稻(谷类)的有9.0%,山薯(块根类)0.4%,大麻(纤维类)0.3%,蔬菜1.9%,其他(芋头)0.1%。各种作物的比例依次为:稻53.8%,山薯33.9%,小麦7.3%,蔬菜2.0%,油菜子1.7%,大麻0.8%,芋头0.4%,杂项0.1%。

但连江的复种指数并不高。全国平均复种指数147%,中东部平均150%,连江117%,仅高于镇海的111%,最高的江宁(淳化镇)197%。连江田场按规模分为三组,对应的复种指数分别为:最小组114%,中等组121%,最大组116%,差距甚微。具体到复种指数的算术平均数、中数等,也没有明显差异。复种指数,全国算术平均数150%,中东部算术平均数150%,连江 $117% \pm 1.18%$,仅高于镇海的 $111% \pm 1.07%$,最高的江宁(淳化镇) $197% \pm 0.35%$ 。全国平均中数156%,中东部平均中数147%,连江 $106% \pm 1.48%$,为中东部最低,江宁(淳化镇) $200% \pm 0.44%$,为中东部最高。

连江的生长季很长,可是冬季作物的种植面积并不十分理想,冬季作物、冬季作物之后的夏季作物、春种作物所占作物公顷面积的比例分别为9.0%、11.7%、79.3%;冬季作物、冬季作物之后的夏季作物、春种作物所占作物面积的比例分别为10.3%、13.2%、89.7%。^①

复种等措施,尤其是农民的精耕细作,使得连江的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以公顷为面积单位)颇可称道。全国小麦平均产量9.67公担(每公担100公斤),中东部平均11.12公担,连江25.68公担,远远高过第2名镇海的11.81公担,江宁(淳化镇)最低,为6.84公担;全国稻平均产量25.59公担,中东部平均28.42公担,连江81.95公担(包括早晚稻),远远高过第2名镇海的39.90公担,来安(1922)最低,为13.77公担;全国油菜子平均产量13.64公担,中东部平均16.01公担,连江

^① 原文(第260—271页)两个数字顺序颠倒。

23.11 公担,远远高过第 2 名来安(1922)的 13.05 公担,镇海最低,为 8.46 公担;全国山薯平均产量 68.48 公担,中东部平均 102.73 公担,连江 102.73 公担,为中东部第 2 名,低于镇海的 135.97 公担;蔬菜,连江 55.01 公担,各地之间差异很大,有数据的几处中,连江超过了来安(1921)的 45.49 公担。

将平均产量作为基数 100,按产量指数来衡量,连江的产量也居于高位。以全国平均产量为 100,连江 195,是中东部最高的,第 2 名来安(1922)173,最低武进 93;以中东部平均产量为 100,连江 158,是中东部最高的,第 2 名来安(1922)130,最低江宁(太平门)81。如果排除调查当年连江为丰年的偶然性,连江大概在中东部仍可维持第 3 位。

连江的农产品价格也比较高,小麦、稻、高粱、谷子、油菜子、山薯、大麻,均居中东部第 1 位;芋头,仅有连江的数据;蔬菜在中东部并列第 3 位。以公担为单位,全国小麦平均价格 6.73 元,中东部平均 6.55 元,连江 10.44 元,居第 1 位,第 2 位芜湖为 8.21 元,江宁(淳化镇)最低,4.77 元;稻,全国平均 5.55 元,中东部平均 5.79 元,连江 6.99 元,居第 1 位,第 2 位来安(1921)6.40 元,江宁(太平门)最低,5.03 元;高粱,连江 8.38 元,中东部另一处有数据的是镇海的 4.44 元;谷子,连江 10.05 元,另一处有数据的是来安(1921)7.31 元;油菜子,全国平均 7.17 元,中东部平均 7.65 元,连江 9.80 元,居第 1 位,第 2 位来安(1921)9.35 元,武进最低,3.02 元;山薯,全国平均 1.77 元,中东部平均 1.88 元,连江与江宁(太平门)均 2.25 元,居第 1 位,第 3 位镇海 1.98 元,来安(1921)最低,1.30 元;大麻,全国平均 21.26 元,中东部平均 7.94 元,连江 11.21 元,居第 1 位,另两处有数据的是来安(1921)8.90 元、来安(1922)3.70 元;蔬菜,全国平均 1.85 元,中东部平均 2.56 元,连江与武进皆 2.48 元,居第 3 位,第 1 位是江宁(淳化镇)3.28 元,第 2 位是镇海 3.20 元,最低是江宁(太平门)的 1.68 元;芋头,连江为 3.55 元。

农产品分为家庭自用和出售两个部分,全国出售部分平均占 52.6%,自用则为 47.4%;中东部出售部分平均占 62.8%,自用则为 37.2%。连江,出售部分占 64.5%,在中东部居第 4 位,镇海最高,占 83.8%,其次是江宁(淳化镇)的 73.7%、江宁(太平门)的 66.4%,最低是武进的 46.3%。专为出售而种的农作物不多,但有几类作物出售占比较高,如油菜子、芝麻、小麦、大豆。就连江的情形而言,小麦的出售部分占比 99.7%,稻 42.6%,油菜子 98.4%,山薯 67.2%,蔬菜 82.7%;谷子、芋头、大麻虽然只有不到 20 家种植,但商品率非常高,谷子 100% 出售,大麻 98.8%,芋头 87.4%。

2. 连江的家畜拥有,目的性十分明确。因地制宜地发展猪、鸡、鸭、羊生产,黄牛提供了较水牛多得多的畜力;家畜虽然总量不多,但平均拥有量不低,提供了田场的部分收入,肥料也推高了农作物产量与田场收入。详见下文具体分析。

卜凯将家畜分为役畜、生产畜。役畜包括黄牛、水牛、驴、马、骡,生产畜包括鸡、鸭、鹅、绵羊、山羊、猪。北部和中东部条件不同,家畜也不太一样。

连江的家畜有黄牛、水牛、鸡、绵羊、猪、鸭、山羊、鹅等 8 种。黄牛,全国共计 1431.7 头(统计年份的平均数,因此有小数点,下同),中东部共计 386 头,连江 113 头,居中东部第 1 位,占中东部总数的 29.3%;水牛,全国共计 569.5 头,中东部共计 567.5 头,连江 10.0 头,除了没有数字的镇海,连江居中东部最后一位,占中东部总数的 1.8%;鸡,全国共计 18540 只,中东部共计 9561 只,连江 829.5 只,居中东部第 6 位,占中东部总数的 8.7%,第 1 位武进 2048.0 只;绵羊,全国共计 6476.5 只,中东部共计 305 只,连江 0.5 只,与镇海并列中东部最后一位,占中东部总数的 0.2%;猪,全国共计 2544.5 头,中东部共计 1993.5 头,连江 382.0 头,居中东部第 2 位,占中东部总数的 19.2%,第 1 位武进 698.0 头,镇海最低,51.0 头;鸭,全国共计 804 只,中东部共计 578.5 只,连江 162.0 只,居中东部第 2 位,占中东部总数的 28.0%,第 1 位来安(1921)250.5 只,江宁(太平门)最低,1.0 只;山羊,全

国共计504.5只,中东部只有2处有数据,连江15.0只,来安(1921)1.5只;鹅,北部少有,仅23只,中东部共计102.5只,连江5.5只,居中东部第4位,占中东部总数的5.4%,第1位来安(1922)77.5只。

连江的各种家畜,其家畜单位所占比例,分别为:黄牛62.0%、水牛8.2%、猪23.4%、鸡4.6%、山羊0.8%、鹅0.1%、鸭0.9%,绵羊不计。就中东部而言,连江的黄牛、猪、鸭占比,居第2位;鸡,居第5位;水牛居末位。因为邻近市场,连江可能会多养鸡;又因多水,且稻田收割后会有洒落的稻粒作为饲料,因此养鸭较多。

至于家畜的普及情况,可用有某种牲畜的田场所占之百分比加以衡量。黄牛,全国平均42.7%,中东部平均30.5%,连江62.7%,居第1位;水牛,全国平均17.5%,中东部平均39.9%,连江6.2%,除了没有数据的镇海,连江是中东部最后一位,来安(1922)最高,达78.0%;鸡,全国平均82.4%,中东部平均91.4%,连江95.7%,居第4位;猪,全国平均45.3%,中东部平均62.4%,连江64.6%,居第5位;绵羊,全国平均15.4%,中东部平均11.4%,连江0.6%,除来安(1921)、来安(1922)、江宁(太平门)没有数据之外,连江为中东部最低;鸭,全国平均9.6%,中东部平均15.6%,连江46.6%,居第1位;山羊,全国平均3.6%,中东部仅有2处有数据,连江1.9%;鹅,全国平均2.0%,中东部平均3.4%,连江5.0%,居第3位。

按照每一家畜单位对应的作物面积、每一家畜单位对应的作物公顷面积等统计家畜密度。对田场而言,一方面,家畜会耗用粮食,另一方面家畜能增加土壤肥料,1家畜单位年产厩肥8吨。每一家畜单位对应的作物面积,全国平均2.00公顷,中东部平均1.54公顷,连江0.89公顷,仅高于武进的0.81公顷,居倒数第2位;每一家畜单位对应的作物公顷面积,全国平均2.92公顷,中东部平均2.32公顷,连江1.01公顷,最低。役畜单位总数,连江128.00,占中东部总数1266.99的10.1%,居第5位。生产畜单位总数,连江54.35,占中东部总数400.56的13.6%,居第2位;生产畜单位占家畜单位总数的百分比,全国平均22.1%,中东部平均22.5%,连江29.8%,居第2位,仅次于武进34.3%。连江的家畜密度在中东部属于最高水平,每个田场平均的家畜数量较高,主要是提供肉和卵的生产畜,而非从事劳作的役畜。

家畜直接影响肥料施用。每一作物公顷所施之人畜粪,全国平均3754公斤,中东部平均4871公斤,连江8775公斤,远远超过全国其他调查点,最低的江宁(太平门)仅1899公斤。每一作物公顷购买肥料(买入的肥料大都系油粕等类,尤以豆饼为最)所费,全国平均2.66元,中东部平均3.67元,连江3.97元,居中东部第3位。

3. 生活习俗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力,近代农村的不少习俗至今仍存。连江整体消费水平较高,衣着与嗜好尤为突出,佃农与自耕农相比较,主要差别在衣着,因为衣着不仅是必须性消费,还是社会生活、社会地位的外在体现,消费之于身份区隔,作用显著。嗜好主要花费在抽烟喝酒,其次是赌博,喝茶花费相对较低。详见下文具体分析。

合并现金与非现金支出,将农家支出归纳为食物、房租、衣着、灯油燃料、医药、生活改进(教育、宗教、娱乐、慈善、社交、新年费用等)、嗜好(茶、烟、鸦片、酒、赌博、债务、理发、送礼、化妆品、饰物等)、器具、杂项开支(丧葬、婚嫁、仆役、讼费等)等9项,全国平均228.32元,中东部平均288.63元,连江336.69元,居中东部第2位,仅次于江宁(淳化镇)的338.80元,超过全国平均数近乎50%。

具体到各个项目,器具、杂项开支,连江没有数据。其他7项:食物,全国平均136.29元,中东部平均156.39元,连江178.27元(占连江农家支出总值的52.9%),居第3位;房租,全国平均11.32元,中东部平均16.20元,连江17.57元(占连江农家支出总值的5.2%),居第3位;衣着,全国平均17.31元,中东部平均25.44元,连江43.07元(占连江农家支出总值的12.8%),居第1位;灯油燃

料,全国平均 25.32 元,中东部平均 32.19 元,连江 27.64 元(占连江农家支出总值的 8.2%),居第 3 位;医药,全国平均 1.85 元,中东部平均 2.57 元,连江 5.58 元(占连江农家支出总值的 1.7%),居第 1 位;生活改进,全国平均 20.61 元,中东部平均 33.12 元,连江 28.58 元(占连江农家支出总值的 8.5%),居第 3 位;嗜好,全国平均 10.26 元,中东部平均 18.17 元,连江 35.98 元(占连江农家支出总值的 10.7%),居第 1 位。

再就各个项目的自给程度来考察,连江农家开支 336.69 元中,200.60 元(即 59.6%)是自给。除了医药、生活改进以及某些类型的嗜好完全由购买而来外,其余各项,自给程度不一:食物自给,全国平均 113.44 元,中东部平均 119.73 元,连江 155.33 元(占自给总值的 77.4%),居第 2 位,有 85.7% 的农户仍需另外购买食物。连江房租 17.57 元(占自给总值的 8.8%),与其他地方一样,完全由本田场供给。衣着自给,全国平均 3.16 元,中东部平均 0.47 元,连江 0.06 元(占自给总值的 0.03%),居中东部末位,由田场供给衣着原料(不是棉花,包括苧麻、羊毛、鸡鸭绒)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1.9%,而需要向市场购买衣着原料的农户占 1.2%;72.0% 的农户需要购买衣服。灯油燃料,有的地方部分购买,但连江完全自给,全国平均 22.45 元,中东部平均 31.46 元,连江 27.64 元(占自给总值的 13.8%),居第 3 位。由田场供给茎秆的农户占 79.5%,由田场供给柴草的农户占 88.8%;每一有灯油燃料开支之农户,平均由田场供给茎秆 17.43 元、柴草 15.52 元。

卜凯将个人嗜好分成田场所供给的烟、茶,以及购买来的鸦片、赌博、烟、茶、酒、杂项、装饰。连江有购买来的赌博、烟、茶、酒 4 项数据。赌博,全国平均支出 12.21 元,中东部平均支出 16.15 元,连江 15.84 元,居中东部第 3 位;烟,全国平均支出 3.66 元,中东部平均支出 5.76 元,连江 14.28 元,在全国遥遥领先;茶,全国平均支出 2.74 元,中东部平均支出 3.44 元,连江 1.17 元,在中东部最低,这和我们闽人嗜茶的认识并不一致;酒,全国平均支出 2.60 元,中东部平均支出 3.61 元,连江 10.09 元,在全国遥遥领先。

有某项嗜好的农家所占百分比,连江的数据依旧显示出沾染烟酒的农户为数不少。赌博,全国农家平均占 30.1%,中东部平均 40.1%,连江 75.8%,在全国遥遥领先,参赌的人虽多,但赌金较小;烟,全国平均占 83.1%,中东部平均 86.7%,连江 97.5%,居全国第 1 位;茶,全国平均占 38.7%,中东部平均 66.4%,连江 19.3%,仅略高于来安(1922) 16.0%;酒,全国平均占 70.9%,中东部平均 78.9%,连江 97.5%,仅次于江宁(太平门)的 97.7%,居全国第 2 位。

六、一点申论

对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连江平原地带农村,我们或许可以从卜凯调查读出更多的内容,以下略作申论。

在连江最为肥沃丰腴的平原地带,人口密度可能超过历来被认为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有限的土地承载着过量人口,为此,人们不惜付出更高的土地成本、租佃代价,奔走更多的路途,在单位面积耕地上投入更多的人力畜力、更多的资本,当然也会获得更高的农作物产量。田场因地制宜种植作物,养殖家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很是不低,留归自身家庭消费的产品也不少,但质量比较低劣。在连江,山薯占自耕农现金收入的 20%,却只占佃农现金收入的 10% 稍多;在安徽宿县,山薯占自耕农收入的 4%,却只占佃农收入的 1%。可见无论地主还是自耕农,生活都不易,对于粗粮也都不愿意放弃;另一方面,红芋(红薯),连江自耕农、佃农均拿来出售,说明需要以此果腹的人还不少,红薯是一种很重要的食粮来源;佃农的生活水平显然要远远低于自耕农、半自耕农。连江的农民抽烟喝酒,衣着整洁(应该不能达到光鲜的程度),他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创造着生活的乐趣。

调查点有着连江最为肥沃的土地,直至现在土地仍被当地人引以为豪。当地人对土地执着追求,占有欲望比较强烈,甚至宁愿花费比别的地方更多的钱买下更少的土地,在可能的情况下,买方

往往要求直接买断,而非典当,调查显示,资本投入的75.9%用于购买土地。土地出租并不盛行,当时的借贷利率可以达到月息2%—3%,连江的地主投资回报率却不能达到月息1%,因此,是获利之外的因素导致这种投资方式的存在。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来投资土地比较安全,二来拥有土地在当地社会也会显得比较体面。傅衣凌在《明清时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一书中对徽州商人既投资土地又不愿投资土地的矛盾心态进行了分析。^①考虑到投资土地相对于投资其他行业的收益偏低,从纯粹经济角度出发,土地显然不是一种好的投资选择。

卜凯惊讶于当时中国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并由此推想,中国农人必须有大量现金购买其他必需品(第275页)。连江农家生产品的相当部分用于出售,而出售的份额,与当地的生活习惯有关,也更加证实了我们对民国时期农村生活商品化的既有认识。谷子完全出售,因为需要加工成面粉,制成面食、糕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它们都是连江精细的副食品来源;大麻在“男耕女织”的时代,是农家重要的手工业原料。衡量年轻女性家务工作能力、女红水平的重要标准,就是把大麻最终织布成衣。大麻基本用来出售,说明此时麻纺织业已经退出家庭,专业化趋势显著;芋头不但可以直接煮食,也可以用于加工多种食品,比如连江小吃里面著名的芋头糕、芋泥。连江城乡生活的精细化,于此可见一斑。

连江调查点的田场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乡村生活的“非自然状态”,作物选择,明显考虑了市场需求。除了稻谷之外,蔬菜也是连江田场的重要收入来源,这可能与三个调查地点的地理位置有关,东湖、山下地处城郊,山藏山邻近重要市镇东岱,蔬菜销售均有去处。虽然在调查中没有体现,但值得一提的是,山藏山历史上以造瓦著称,专业化经营十分典型。

家畜生产的商品化痕迹也相当显著。役畜主要是黄牛与水牛,都是稻作区农户的好帮手,役力强,耕田犁地都好用。在20世纪后半期之前,连江人基本不食用牛肉,一是多种习俗禁止食用牛肉,二是牛被认为是农夫的好伙伴,不能轻易宰杀。老牛死后也会被妥善掩埋,只有雷电轰倒的耕牛,可能才是乡村难得的牛肉来源。至于连江三个调查地更多使用黄牛的原因,或者是因为黄牛、水牛的价钱差异,或者是因为使用习惯,或者是因为获得来源难易程度不同,目前没有充分证据有助于做出明确判断。

就生产畜来看,绵羊、鹅可以忽略不计;数量最多的是鸡,猪、鸭的数量也不少;山羊数量虽不多,但在中东部比较显眼。按照习惯,猪是圈养的,喂猪的是山薯叶(所以山薯特别重要)、糠皮(很好的喂猪食料)、野菜,以及邻居们提供的少油的泔水。年终杀猪卖肉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屠宰者得到工钱,养猪户自己卖肉,一种是养猪户留下内脏之类,屠宰者付净猪肉的钱后得到猪肉;不管哪种方式,内脏(连江话称“下水”),都会被用来感谢邻居的日常照应。养猪的田场平均每个田场3.67头,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可以为场主累积一笔资金。鸡,某种程度上兼有猪的功效,家庭养殖,利用零碎食料,在市场上出售鸡蛋和整鸡,可以换取一些零花钱补贴家用,也能为家庭逢年过节增添一点奢侈的食物;养鸡的田场平均每个田场5.38只,大概除了自己食用之外,仅能提供一定数量的可供出售的鸡蛋和一两只肉鸡。

三个调查地有着丰裕的水面,池塘、河流、小溪,适合养鸭,调查中没有讲明养鸭的种类,据笔者所知,连江鸭子主要三大类,即蛋鸭、番鸭、半番鸭。当地人相信鸭蛋的营养胜过鸡蛋,且因为在水面生活,鸭蛋被认为具有滋阴的功效,生日要吃鸭蛋、婚宴要吃鸭蛋,名目很多。蛋鸭一般成规模养殖,多在水边搭盖简易的寮舍,家中有专门的放鸭人,鸭子除了喂食谷粒之类外,也补充钓来的青蛙,鸭子还会捕食水里的小鱼小虾。番鸭一般是圈养,家里养三数只,耗粮较多,据说食用番鸭有助于人增强气力,因此家里自食的并不多,多数往市场上销售。半番鸭也是圈养,是家里主要的肉类

^①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1—82页。

来源。还有一类连江人喜爱的鸭子,蛋鸭未生蛋之前将其阉割,称水鸭(母),当地人认为是养生的好食材,会用于季节性煲汤。如果说养鸭的田场平均不到 3 只(2.16 只),说明成规模搭盖寮舍的情景基本不存在,多数田场只是养殖三数只或生蛋或出售或自己食用的鸭子。山羊,适合山丘放养,山羊肉也是当地人喜好的食材,调查显示连江总共才有 15 只,可能是数家相对集中的养殖,供市场出售。

许倬云曾将汉代农业社会形容为“重商性农业的社会”,小农精耕细作,投入劳力、资本多,产出也多,依仗非农生产及市场交换为挹注,而非“那种由无数分散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户细胞所构成的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图景”。^①那么,2000 多年后民国时代的中国东南农村,似乎仍是如此景象,某种意义上,小农经济与市场交换实际上构成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

农业是传统时代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与民众衣食之源,农业无疑是最重要的,即便对于手工业地区也是如此。曹幸穗通过对“满铁”调查资料的研究后发现,种植业在江南农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与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多少呈正相关关系,他认为,这说明农民的生产安排总是在满足耕地经营之后,才会将剩余劳力转向其他生产活动。^②就全国 17 处调查点来看,有 12 处、调查总数 48.7% 的场主有农业以外的其他收入,但不包括连江。可见,包括地租、家庭工艺、佣工(分粗工、细工)、专门职业、商业、利息、在外家属寄回、其他等 8 种农业以外的收入在连江即便有,也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

我们知道调查地点濒临河流,距离出海口尤其是江海交汇处实不甚远。连江是中国东南著名的海域大县,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闽江口北岸,东濒台湾海峡,与台湾岛、马祖列岛一衣带水。全县总面积 4280 平方公里,其中海域面积 3112 平方公里、陆域面积 1168 平方公里(包括马祖列岛),耕地面积 11147 公顷、沿海滩涂 13819 公顷。^③然而卜凯提出连江可以得到铁道运输的便利,却没有提及距离不远的海,也没有提及河流(第 17 页)。最重要的原因仍在于调查过程中当地人的描绘,以及郑庚本人的认识。因此,对于距海似乎并不遥远的平原地带,当地人将土地产出作为最重要的生业,而与海洋相关的渔业、海洋运输、养殖等等并不在考虑之列。

海洋生活区域不仅包括广阔的海洋,还有浅海、滩涂、海边的沙地,以及靠近海边的耕地等等。海洋区域的生业方式,不是仅仅依靠海洋提供的种种资源,而与技术条件(包括交通运输条件)、物质需求等等均有着密切关系。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海洋生活区域的人们,与大海的关系存在着很大差异。仅就历史过程而言,海洋生活区域人们与海洋生业的契合度,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由高到低再转高的趋势。

早期先民,他们从海洋中、滩涂中、浅海中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渔业捕捞成为食物的最重要来源,采集倒在其次,我们从东南沿海出土遗址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碳水化合物在食物组成中重要性的增强,直接影响了稻麦之类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粮食种植业因此在传统社会有着超乎寻常的地位。对于海洋生活区域的人们来说,相较于粮食种植业,捕捞仅是一种补充,用渔获所得换取粮食、生活必需品。服装也是如此,棉麻服饰的舒适度、保暖性,显然也不是鱼皮衣所能比拟的。至于海上贸易,需要整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及海上航行技术、造船技术的进步,不然,对于海洋区域的人们来说,大海大洋的惊涛骇浪仍是令人畏惧的障碍。诸事皆齐,海洋区域的人们因为地利之便,发展海上交通,复因养殖技术进步,扩大生产的获取,与海洋的契合度不断提高。民国及之前时代,滨海地域的社会生活也许需要更为细致深入

①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中文版序”第 3 页。

②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2 页。

③ 2019 年统计数,参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连江县/1863210?fr=ge_al,最近访问时间:2023 年 8 月 4 日。

的梳理。

20世纪上半叶,在时人的描述与后人的研究里,呈现出一幅农村变革的壮阔图景。20世纪初,清末新政推行,接着辛亥革命发生,政权更迭,政局动荡,乡村社会遭受严重破坏,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扩展,抗租抗税斗争此起彼伏。^①农民、农村、农业经济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的重要关注。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尤其是1933年前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乡村社会的衰败与式微,引起学术界、媒体更多的关注、讨论和期待,1932年茅盾小说《春蚕》^②、1933年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③,都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的困顿和悲凉,刻画至深。农村凋敝、乡村危机,成为主要社会力量、政治力量规划未来的基点。^④卜凯第一次调查成果英文版刊行于1930年,而在中国国内引起关注则是在1934年,1934年4月、10月连续发表了两篇很有分量的书评。^⑤书评一面肯定了该书“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独一无二著作”“取得了国际学者的重视”“代表其技术的高度和观念的水准”,另一面对其研究方法提出了学理性与政治性的批评,自然也涉及其结论的可靠性。

卜凯在连江的调查时点为1922—1923年,调查资料中可见东南乡村生活简单朴素,农户尽其所能,生产有限物资,从市场获得必需品,生活如一潭沉寂的水,温和而宁静。卜凯基于其调查对中国农村的“相对乐观”,有别于当时多数人的认识,也与后人观察不同,^⑥但其中容易为人忽略的一点是时间节点的不同。对中国农村的深刻检讨以及农村建设言论的聚集,实际上主要发生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卜凯调查第一次发生的时间,恰在20世纪初清末民国转折之后与30年代经济危机中间,是一个短暂的真实存在。因此,我们在评价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状况并由此探究中国革命根由的时候,也许不能忽略历史发展的多维曲线。

The Picture of Rural Life in Southeast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in Feng, Ke Liyu

Abstract: The survey conducted by John L. Buke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rural survey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anjiang, Fujian Province, one of the 15 sites (out of 17) where John L. Buke carried out his first survey, is chosen to be analyzed specifically in terms of its survey data in order to show scenarios of rural life in southeastern China in the 1920s, to try to rethink the occurrence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o explore the way of livelihood of the coastal society again.

Keywords: Buke's Chinese Rural Survey, Rural Life, Chinese Revolution, Coastal Society

(责任编辑:高超群)

① 蒋伯英主编:《福建革命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

③ 《文学》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

④ 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⑤ 巫宝三:《〈中国农场经济〉书评》,《大公报》1933年4月5日,第11版;1933年4月12日,第11版。钱俊瑞:《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中国农村》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

⑥ 李金铮:《发展还是衰落: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演变趋势》,《史学月刊》2013年第11期。